

形狀量詞分佈的跨方言比較 ——兼論粵方言形狀量詞的類型特點

徐毅發

北京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提要

本文採取語義參數和語義地圖模型結合的方法，研究漢語方言的形狀量詞與名詞的搭配規律。在對 19 種漢語方言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對形狀量詞（顆粒、平面和條形）在漢語方言中的分佈格局進行了比較，發現形狀量詞呈現出“核心－擴散”的跨方言分佈模式和系統的南北差異，最後以此為背景簡論粵方言形狀量詞的系統特點。

關鍵詞

形狀量詞，語義地圖模型，方言比較，核心－擴散分佈

1. 引言

1.1. 問題緣起

過去從分類詞（classifiers）的角度對漢語形狀量詞（顆粒、平面和條形）與名詞搭配規律的研究，多遵循歸納語義參數（特徵）的思路。Allan（1977）、Aikhenvald（2000: Ch 4）等類型學研究反映出東亞語言（如漢語）的個體量詞常見的分類參數有：生命度（animacy）、形狀（shape）、大小（size）、固有性質（inherent nature）和功能（function）等。邵敬敏（1993）從名詞和量詞雙向選擇的角度進行的研究、Tai（1992, 1994）對普通話和方言個體量詞的研究、陳小明（2010）對粵語量詞的研究都主要運用歸納語義參數的方法。

歸納語義參數的方法有助於我們快速勾勒某種語言或方言分類詞系統的概貌，但其缺點是規律的顆粒度過粗，如果要對不同語言或方言的分類詞系統進行比較，則難以捕捉更細微的語言事實，語義參數往往遇到“例外”。比如，顆粒量詞“粒”在大多數漢語方言中都使用，前人研究多認為“粒”具有[+小]和[+圓]兩個語義特徵。¹

¹ 如張禎（2010: 250）對“顆”和“粒”的屬性描述都是“形狀：圓形”；張禎（2009）：“‘顆、粒’用法相近，但‘粒’限于‘小’的東西。”

但問題是，不同方言裏的“粒”搭配能力不盡相同。例如北京話、廣州話、泉州話的“粒”就有這樣的差別：

北京話：一粒芝麻 / * 一粒湯圓 / * 一粒雞蛋

廣州話：一粒芝麻 / 一粒湯圓 / * 一粒雞蛋

泉州話：一粒芝麻 / 一粒湯圓 / 一粒雞蛋

同是 [+ 小][+ 圓] 這兩個語義參數，在北京話中接受“芝麻”而排斥“湯圓、雞蛋”；廣州話接受“芝麻、湯圓”而排斥“雞蛋”；泉州話則把三者都納入到這一語義參數中。可見，如果只用“小而圓”這個語義參數一以貫之，則無法體現同一個參數在不同方言中的具體實現，無法容納的現象因而就成為了語義參數規則的“例外”。

除了語義參數的思路，有的學者從圖形認知角度提出物體三個維度的長度比例是決定量詞選擇的根本原因，量詞選擇規律可總結為一種函數關係（石毓智 2000）。但是，圖形認知的研究角度主要針對形狀量詞內部次類之間的選擇（如顆粒、平面或條形），並不能反映形狀量詞與非形狀量詞的對立（如下文 2.2、2.3 討論的形狀量詞與功用量詞“把”之間的競爭），也不能反映量詞選擇規律在方言裏的變異。

此外，過往研究的對象多限於普通話，但方言中（特別是閩粵等南方方言）在形狀量詞分類系統上表現出了值得注意的類型差異。儘管方言比較的研究角度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如 Tai（1992）、高然（1999）比較了普通話與閩粵等南方方言個體量詞的異同，但這些比較研究仍以語義特徵的思路為主，比較的手段又多為列表或個別舉例，未能系統而直觀地反映形狀量詞搭配規律在漢語方言裏的變異。

1.2. 本文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我們認為真正的問題並不是語義參數歸納得“不正確”，而在於語義參數顆粒度太粗，無法捕捉那些有類型學價值的方言變異，為此，我們嘗試採用語義參數和語義地圖模型兩者結合的研究方法。語義地圖模型（Semantic Maps Model）是描寫和解釋多功能語法形式的各種功能之間關係遠近的一種方法，基於若干語言的情況設定由多個功能節點組成的概念空間，再把某個語言某語法形式的分佈展現在概念空間上形成語義地圖，並隨著語言樣本的增加不斷修改概念空間，以提高普適性。設定概念空間時需要遵守一些準則，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基元準則”和“連續性假設”。²

² “基元準則”是指概念空間上的任何功能都必須是原始的（primitive），即在任何語言中都不會以不同形式再進行細分；“連續性假設（Connectivity Hypothesis）”是指某個功能形式在概念空間上的分佈應該是一個連續的區域，避免出現跨層連接。基元準則主要針對節點的設定，連續性

語義地圖模型的長處是將某個語法形式在語言（或方言）之間的功能差異可視化，有效地分析趙元任先生所說的方言之間同中有異的“偏側關係（skewed relation）”。

語義地圖模型目前主要用於多功能語法形式的研究，本文則嘗試將其應用於形狀量詞研究。操作原理是：將形狀量詞看作一個多功能詞彙形式，與某一類或一個名詞（事物）搭配即相當於一種功能，以具體的名詞（事物）作為功能節點構造概念空間，再把形狀量詞的分佈反映在概念空間上。

1.3. 方言樣本和語料來源

本文共考察了 19 個方言點，涉及七大方言，它們分別是：

官話：北京、吉林白山（東北官話）、山東德州（冀魯官話）、河南許昌（中原官話）、湖北鄂州（江淮官話）、四川成都（西南官話）；晉語：呼倫貝爾；吳語：江蘇常熟、浙江嘉興；湘語：湘南道縣；客家話：江西贛縣、福建清流；閩語：福建漳州、福建泉州、廣東汕頭（閩南語），福建福清（閩東方言）；粵語：廣東廣州、廣東肇慶、廣西南寧。

以上方言材料大多數來自對方言區同學的調查（其中清流客家話的材料來自北京大學 2015 年暑期方言調查實習，肇慶話為筆者母方言）；另外有三個點的材料來自有詳細描寫的文獻：湘南道縣土話（羅昕如 2003）、南寧話（梁滢 2012）、漳州話（高然 1999）。

2. 形狀量詞的語義參數及其跨方言實現

2.1. 顆粒量詞

2.1.1. 顆粒量詞“大小”參數與方言差異

這裏的顆粒量詞就是指“顆”和“粒”，我們所調查的方言都使用這兩個量詞中的一個或兩個。在普通話中，“微小的物體”和“較小的球狀物”是和顆粒量詞搭配的典型成員，如“一粒芝麻”、“一顆珍珠”。而當球狀物的直徑或物體的尺寸增大到一定程度時，就不能再用顆粒量詞了，如“乒乓球”和“足球”，在普通話中只能用“個”。這說明顆粒量詞存在“大小（size）”這一個參數。不過，正如引言中所說，北京話、廣州話和泉州話裏的“粒”能接受的物體大小不盡相同。那麼，“粒/顆”與非顆粒量詞（如“個”）的分界線在不同方言間的差異到底如何？

假設主要針對節點的排列和連接。可參看 Haspelmath (2003), De Haan (2004), 李小凡、張敏、郭銳等 (2015)。

我們參照普通話中顆粒量詞的搭配範圍，選取了日常生活中比較常見的小顆粒物、球狀物和類球狀物 20 種進行了跨方言調查，按照直徑大小將它們依次排列，並把顆粒量詞（顆/粒）的格子塗成淺灰色，把非顆粒量詞（個/隻/塊）的格子塗成白色，被調查者表示顆粒量詞和非顆粒量詞兩可的格子塗成深灰色（斜綫前為更常用的），然後大致按照淺灰色格子的多少從上到下、從少到多排列這些方言，形成表一：³

表一 顆粒量詞在漢語方言中的分佈

項目 方言	沙子	米粒	芝麻	星星	彈珠	水果糖	棗核	葡萄	湯圓	乒乓球	蘋果	電燈泡	足球
清流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許昌	粒/個	粒	個	顆	個	塊/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北京	粒	粒	粒	顆	個	個/顆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白山	粒	粒	粒	顆	個	塊/顆	個	個/粒	個	個	個	個	個
呼倫貝爾	粒	粒	粒	顆	粒	塊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德州	顆/粒	粒	粒	顆	個	塊/顆	個	個/粒	個	個	個	個	個
成都	顆	顆	顆	顆	顆	顆/個	個	顆	個	個	個	個	個
鄂州	粒	粒	粒	顆	粒	粒	粒/個	個	個	個	個	個	個
贛縣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顆	個/顆	個	個	個	個	個
常熟	粒	粒	粒	顆	粒	粒	粒	粒	個	個	隻	隻	個
嘉興	顆/粒	粒	顆	顆	顆	顆	顆	顆/隻	顆	隻	隻	隻	隻
肇慶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隻	隻	隻	隻
廣州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隻	隻	隻	隻
福清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泉州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汕頭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粒

需要說明的是，對於某個項目，選擇顆粒量詞還是非顆粒量詞可以看作“主要對立”；而在顆粒量詞內部用“粒”還是“顆”，在非顆粒量詞內部用“塊”、“個”還是“隻”，則可以看作“次要對立”。⁴ 本文關注的是“主要對立”，即顆粒量詞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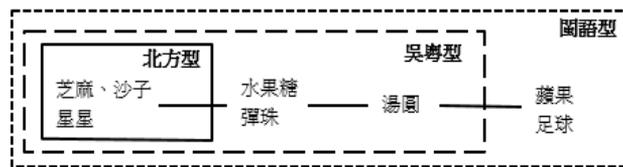
³ 說明：（1）繪製表格時為簡潔起見，在不違反基元準則的前提下對某些項目進行了歸並。例如“星星”和“珍珠”，在本文所調查的方言中都不使用不同的形狀量詞（要麼都用“顆”，要麼都用“粒”），可選其中一個為代表。歸並前所調查的 20 個項目分別為：沙子、芝麻、米粒、瓜子、星星、彈珠、珍珠、水果糖、棗核、葡萄、櫻桃、紅棗、湯圓、肉丸子、乒乓球、雞蛋、蘋果、電燈泡、足球。下文對平面、條形量詞的分析也作了類似的歸並；（2）有些調查項目在方言中有不同的說法，調查時讓被調查者轉換為當地方言的說法，如“彈珠”山東德州方言叫“溜溜蛋”，但在行文中僅以普通話的說法為代表；（3）採用文獻資料的三種方言因項目不全未列在表一中。

⁴ “次要對立”的成因比較複雜，如文白層次、來源不同等都有可能。比如，粵語的“粒”是口語層次的，在書面語中才會用“顆”（如歌詞裏的“一顆星星”）；但在嘉興、贛縣等方言點中，

非顆粒量詞的對立。如表一所示，顆粒與非顆粒量詞在不同方言中的分界點不同，這些分界點排列起來構成了一個連續統。連續統的兩個端點是對顆粒量詞與非顆粒量詞的對立不敏感的方言，不論物體直徑大小，一律用顆粒量詞的是閩方言（福清、泉州、汕頭），不論大小都不用顆粒量詞（而是用“個”）的是個別客家方言（清流）和個別北方方言（許昌）。不少方言中某些項目出現了顆粒量詞與非顆粒量詞兩可的情況，從表一可見，這種兩可的情況多出現在該方言顆粒量詞與非顆粒量詞分界綫的附近。我們推測，這可能是強勢量詞（如通用型量詞“個”）逐漸向顆粒量詞的範圍滲透的結果。表一大致反映了顆粒量詞在“大小”參數上的搭配範圍由北往南逐漸擴大。

有人可能會質疑，這些分界點的不同是否主要反映了個體差異而非方言差異？比如“棗核”與“葡萄”，外形大小相對於人的日常認知來說相差很小，難道在某方言中足以形成“個”與“粒”的對立？我們認為，對於某些分界點，以本文的樣本規模確實無法排除個體差異的原因，但對於某些分界點，調查結果比較肯定地說明它們反映了方言間的差異而非個體差異。我們把這些分界點抽取出來，繪製成反映顆粒量詞方言類型差異的概念地圖：

圖一 顆粒量詞“大小”參數連續統



I. 北方型，包括：清流、許昌、北京、白山、呼倫貝爾，其中的關鍵節點是：“水果糖”或“彈珠”。北方型的幾種方言對這兩種物體最常用的量詞分別是“塊”和“個”，而不是“顆/粒”；北方型以北方方言為主，但也包括某些客家方言（“個”擴張為通用型量詞）。

II. 吳粵型，包括：廣州、肇慶、南寧、嘉興，其中的關鍵節點是：“湯圓”與“乒乓球”。粵語和部分吳語方言的“顆/粒”可用於湯圓，但不能用於乒乓球。

III. 閩語型，包括：泉州、汕頭、福清，關鍵節點是“乒乓球”。“乒乓球”以及比它大的球狀物可以用“粒”的方言，一定是閩語型的。

IV. 南北過渡型，介乎於北方型和吳粵型之間的方言點有：德州、鄂州、常熟、成都、贛縣等地，顆粒量詞的界限在這些方言之間參差不齊，是否真的屬方言特徵而非個體差異，還需進一步研究。

“顆”則是口語中更常見的。本文暫不考慮這種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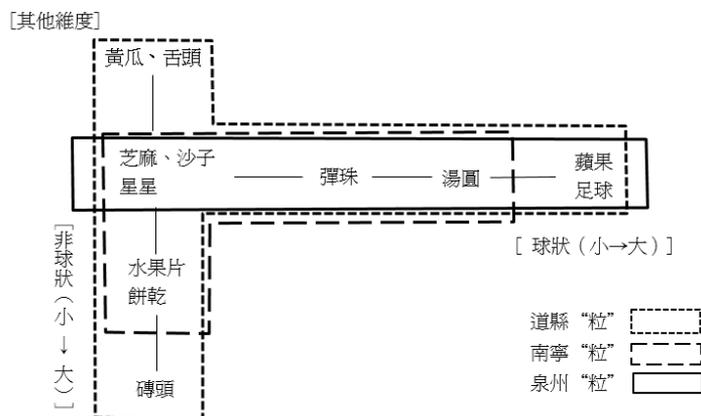
2.1.2. 另外的擴展方向

上面我們所設計的調查項目都基本具有 [+ 圓] 或 [+ 球狀] 的特徵，“大小”這個參數的變化是以這兩個特徵為前提的。進一步的文獻考察發現，某些方言裏的顆粒量詞還存在向 [- 圓] 或 [- 球狀] 方向的擴展，擴展的起點往往是從“較小的不規則形狀物體”開始的。其中一個擴展類型是廣西南寧話（梁滢 2012）。南寧話的“粒”可用於“小巧玲瓏的片狀物”，如“餅乾”，或者“切開的水果等形狀不規則的角狀物體”，如“一粒西瓜”（也說“一月西瓜”）。南寧話的“粒”的搭配範圍比廣州話多出了“體積較小的不規則物”（不一定是所有此類事物），但南寧話的“粒”不能用於“蘋果”、“西瓜”這類直徑較大的球狀物，不同於閩語型方言。

另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是湘南道縣仙子腳鎮土話（羅昕如 2003）。該方言的“粒”[la⁴¹]，除了可用於球狀物“蘋果”、“西瓜”，還可用於體積不大的方塊狀物，如“磚頭”、“薑”，還可用於部分條狀物如“黃瓜”、“舌頭”，甚至可用於抽象概念如“題目”、“文件”等，已逐步向通用型量詞發展。

南寧話和道縣土話的例子提供了顆粒量詞擴展的另外兩種可能的路徑。與 2.1.1. 閩語型的“粒”覆蓋所有球狀或圓形物不同，南寧話的“粒”在球狀物的範疇裏並沒有擴展到“西瓜”一類較大的球狀物，但却向 [+ 小] [- 球狀] 的特徵有所擴展；道縣土話則代表了“粒”向多個參數擴展成通用型量詞的可能性。結合方言調查和文獻考察的結果，我們可以將 2.1.1. 的圖一擴充為更完整的顆粒量詞語義地圖：

圖二 漢語方言顆粒量詞的語義地圖



圖二展示了漢語方言顆粒量詞呈現出“核心-擴散”的分佈模式。可見，過去對顆粒量詞“[+ 小][+ 圓]”的語義特徵的概括並非真相的全部，[+ 小]或[+ 圓]這些語義參數在方言中對應的事物可能是不同的。“芝麻、沙子、星星”在絕大多數被調

查方言中都使用顆粒量詞，因而它們是顆粒量詞穩定的“核心成員”；有的事物“圓而不小”或“小而不圓”，它們是否歸屬於顆粒量詞範疇在方言之間表現不一，但總體上各種方言可沿著“大小”參數排列成連續統（表一、圖一），可看作顆粒量詞的範圍在不同方言中從核心成員向非核心成員的不均勻擴散。下面 2.2. 和 2.3. 小節分別討論平面量詞和條形量詞，調查發現這兩類量詞也表現出與顆粒量詞相似的核心－擴散模式。

2.2. 平面量詞

2.2.1. 平面量詞的語義參數與方言差異

本文考察的平面量詞主要有“張”、“塊”、“片”等。相較於顆粒量詞，平面量詞和條形量詞的數量更多，涉及的語義參數也更多，這使得要從日常事物中找出在某個參數上形成“最小對立”的兩個事物難度大增。平面量詞的調查項目有：紙、床、被子、涼席、椅子、凳子、毛巾、木板、餅乾、樹葉、臉、菜刀等事物，涉及的語義參數有凸顯部位、凸顯形態、厚度、表面積、人體部位、專用量詞等六個，現將參數設定和調查結果簡述如下：

(1) 凸顯部位 與顆粒量詞相似，我們首先關注條形量詞與非條形量詞的競爭。“凸顯部位”是個體量詞的一種重要語義來源，對形狀不規則的物體進行歸類時，常常以其外形的凸顯部位作為分類依據，如以“頭”作為牛、豬等動物的個體量詞。不過，對於同一物體，不同方言分類時對其凸顯部位的選取不一定相同。以“椅子”為例，調查發現，多數方言都用“把”，即將椅子的凸顯部位設定為其“靠背”（人移動椅子時用手抓握），與其他帶把手的事物歸為一類；粵語、閩南語則多使用“張”，以“承載面”為椅子的凸顯部位，和凳子、桌子歸為一類。詳見表二：

表二 “凸顯部位”參數中的連續統

	床	凳子	椅子	菜刀
白山	張	個	把	把
德州	張	張	把	把
贛縣	張	張	把	把
泉州	張	朵	朵 ⁵	支
肇慶	張	張	張	張

⁵ 泉州話的“朵”屬於平面量詞，它可與“薯片”、“餅乾”、“抹布”等事物搭配，與其他方言中“塊”的範圍部分重合。

表二反映了南方方言在“凸顯部位”這一參數上受非平面量詞“把/個”的影響相較於北方方言要少，對於包含平面特徵的不規則事物，更傾向於選擇平面作為其凸顯部位。廣州話、肇慶話裏的“張”的勢力更是延伸到“菜刀”這樣的平面特徵不算明顯的事物。

(2) 凸顯形態 “凸顯形態”是指某些物體在不同場合或狀態下有不同的外形（可能更接近於平面，也可能更接近條形或其他形狀），這些物體進入形狀量詞系統時選取其最凸顯的外形為分類依據。以“涼席”為例，選取它攤開時的外形與卷起來的外形為凸顯形態，所用的量詞就可能不同：有的方言將它歸為和“紙”、“床”一類（如廣州話用“張”），有的則歸為條形範疇（如鄂州話用“條”）。另一個調查項目“毛巾”，在所有被調查方言中則表現高度一致（都用“條”），這可能是因為毛巾一類事物在全國家庭中的使用習慣比較一致（常態下懸挂起來呈條形）。

(3) 人體部位與專用量詞 “人體部位”考察的項目是“臉”，目的是看方言是否會因“臉”具有“人體部位”的特徵而使用非平面量詞，結果是絕大多數被調查方言都使用平面量詞中的某一個（大多數方言用“張”，閩粵有不同表現；常熟用“隻”）。“專用量詞”考察的項目是“被子”，發現絕大多數方言都用專用量詞“床”，但粵語仍用平面量詞“張”。

(4) 厚度與表面積 事物的相對厚度與相對表面積這兩個參數主要影響平面量詞內部次類（“片”、“塊”、“張”）之間的競爭。厚度方面，我們選取了“樹葉—餅乾—木板”這一組厚度逐漸增大的事物。⁶ 調查發現，“餅乾”和“木板”在所有被調查方言中都被歸為一類（用“塊”），而“樹葉”和“餅乾”在多數方言裏都以“片”與“塊”區分，但也有方言把三種事物歸為一類，如肇慶話（粵語）都用平面量詞[nai³⁵]。表面積方面，我們選取了“抹布”和“桌布”這兩種厚度相近、後者比前者表面積大的事物。調查發現這一參數的作用不太明顯，大多數方言對“抹布”使用“塊”，但“桌布”則用“塊”或“張”都很常見（見表三）。

與顆粒量詞的做法相似，我們在不違反“基元準則”的前提下對某些項目進行了歸並，限於篇幅，僅選取部分方言的結果列表如下（平面量詞的格子塗成淺灰色）：⁷

⁶ “樹葉—餅乾—木板”這一組事物在厚度變化的同時表面積也在變化，並未構成嚴格的最小對立。這個問題在以日常事物為調查項目的調查中很難避免。不過，這些項目已基本能反映特定的語義參數在方言之間的差異，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⁷ “紙”和“床”在所有被調查方言中都用“張”，因空間所限未列在表二中，但它們在平面量詞的概念空間（圖三）裏置于中心位置。

表三 平面量詞各參數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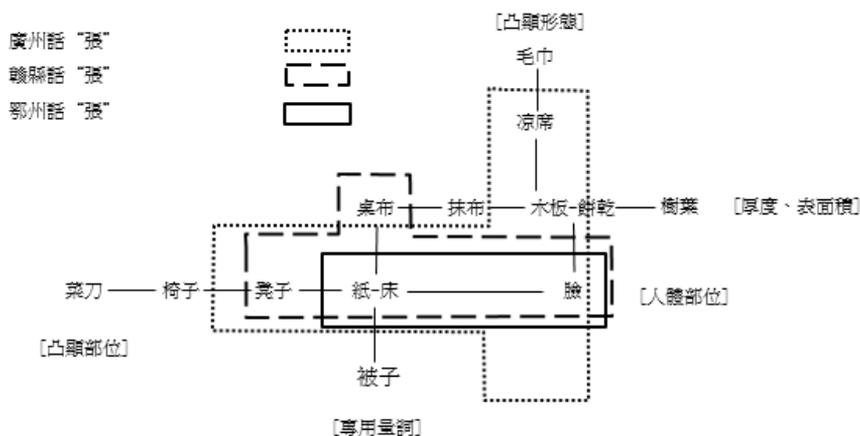
參數	厚度		表面積		人體	凸顯形態		凸顯部位			專用
項目	樹葉	餅乾	抹布	桌布	臉	涼席	毛巾	凳子	椅子	菜刀	被子
北京	片	塊	塊	塊	張	塊/個	條	條/個	把	把	床
德州	片	塊	塊	張	張	張	條	張	把	把	床
鄂州	個	塊	塊	塊	張	條	條	個	個	把	床
成都	片	塊	根	張	張	張	條	根	把	把	床
贛縣	片	塊	塊	張	張	張	條	張	把	把	床
泉州	片	垛	垛	塊	垛	領	條	垛	垛	支	床/領
肇慶	nai ³⁵	nai ³⁵	nai ³⁵	張	片	張	條	張	張	張	張

從表三可見，由於平面量詞涉及的參數更多，量詞在各個參數上的擴展變異程度也大大增加，南北差異不如顆粒量詞那樣整齊。不過，在某些參數上我們還是能看到類似顆粒量詞的跨方言連續統模式，比如上述表二所示的“凸顯部位”參數。

2.2.2. 平面量詞範疇的語義地圖

根據調查結果，我們初步繪製出適用於大多數方言的平面量詞範疇語義地圖，並畫上廣州、贛縣和鄂州三個點的量詞“張”的範圍以示比較：

圖三 漢語方言平面量詞的語義地圖



在我們調查的 19 種方言中，“紙”、“床”均用量詞“張”，“木板”、“餅乾”均用“塊”，它們分別處於“張”和“塊”的核心地帶。從核心地帶出發，“張”沿著“凸顯部位”、“凸顯形態”等語義參數在方言中有不同程度的擴展；“塊”也沿著“厚度”、“表面積”等參數與“張”和“片”互相競爭。為了盡可能照顧各種方言的情況，圖三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回路 (loop)”（如“木板、餅乾”與“臉”之間的連線，因為粵方言對這兩個節點的项目都用“塊”）。

2.3. 條形量詞

2.3.1. 條形量詞範疇的參數與方言差異

本文考察的條形量詞主要是“根”、“支”、“條”、“莖”等。與平面量詞相似，條形量詞也涉及較多語義參數，包括“帶把工具”、“柱狀容器”、“長度”、“可彎曲度”、“粗細”、“人體部位”共六個，參數的設定和調查結果簡述如下：

(1) 帶把工具 與前面的做法類似，我們首先關注條形和非條形量詞之間的競爭，其中比較重要的非條形量詞是“把”。⁸ 我們選取了一批帶把兒的、整體上呈長條狀的工具（如螺絲刀）進行調查，發現這些事物在官話方言裏多用“把”，在閩粵等南方方言裏則多用條形量詞（如“支”）。條形量詞與“把”的分界綫因方言而異，“把”的勢力總體上呈現出由北往南越來越弱的趨勢：

表四 “帶把工具” 參數連續統

	針	鑰匙	螺絲刀	鋤頭 / 雨傘
北京	根	把	把	把
成都	根	把	把	把
鄂州	根	根	把	把
肇慶	支	條	支	把
漳州	支	支	支	支

表四反映的南北連續統分佈可以理解為不同方言的條形量詞系統受到 [+ 帶把工具] 這個語義參數的影響程度不同。“帶把工具”參數在大多數官話方言裏比較顯赫，在其影響下條形量詞多讓位於“把”；而在粵閩等南方方言裏則勢力較弱，這些南方方言對於帶把兒的工具仍以其整體外形（一般都為長條形）為分類依據，將它們與其他不帶把兒的長條事物歸為一類。不過，南方方言受帶把工具參數的影響程度也是參差不齊的，如鄂州話只有少數帶把工具（如“鑰匙”）可用“根”，其他帶把事物都用“把”；肇慶話的條形量詞可覆蓋到“螺絲刀”，但其他外形更長或把兒更長的工具如“鋤頭、雨傘”則和官話方言一樣用“把”；漳州話則上述事物都可用條形量詞“支”。

(2) 柱狀容器 另一個影響條形事物歸類的語義參數是“柱狀容器”。本文調查的具有“柱狀容器”特徵的事物是“針筒”、“（瓶裝）醬油”和“（瓶裝）啤酒”。結果發現，大多數方言對瓶裝事物使用專門量詞“瓶”，而閩粵兩種方言則仍可使用

⁸ 多數研究都不將“把”歸到形狀量詞，但張頴（2010: 232）認為“把”在近代漢語由“功用量詞”發展為“形狀量詞”。我們認為，“把”反映了一個獨立的語義參數（以事物的凸顯部位為分類依據），與形狀量詞有重要區別。

條形量詞（“支”）。與“帶把工具”的情況相似，粵閩這兩種南方方言的條形量詞系統受“柱狀容器”的影響程度遠低於官話方言。

（3）人體部位 調查的項目有“頭髮、手指、胳膊”。“頭髮”在所有被調查方言中都使用條形量詞中的某一個；“手指”和“胳膊”在某些方言中改用非條形量詞（如粵語用“隻”），可能是受到人體部位參數的幹擾而與其他條形事物區別開。

（4）“長度”與“可彎曲度” 這兩個參數主要與條形量詞內部小類（如條、根）之間的競爭有關。過去研究認為普通話的“條”所表示的事物“多呈彎曲狀”，並且“長而未必細”；“根”則不專門標識長短或可彎曲度（朱慶明 1994）。調查發現，“根”和“條”的界限在方言之間大致上也是連續的，很難僅用語義特徵去約束所有成員：

表五 “可彎曲度”參數連續統

	黃瓜	繩子	皮帶	項鍊	蛇 / 魚
廣州	條	條	條	條	條
許昌	根	條	條	條	條
德州	根	根	根	條	條
鄂州	根	根	根	根	條
成都	根	根	根	根	根

表五中第二至第五行都是官話方言，其中“根”的分佈也大致上呈現出由北往南逐漸擴大的趨勢，成都話（西南官話）的“根”範圍最大，甚至可覆蓋到“蛇、魚”這類具有 [+有生] 特徵的條形事物。有趣的是，粵語的“條”範圍與官話方言裏的“條”和“根”都有交集，並不限於可彎曲度較高或較長的事物，如可說“一條柱”和“一條頭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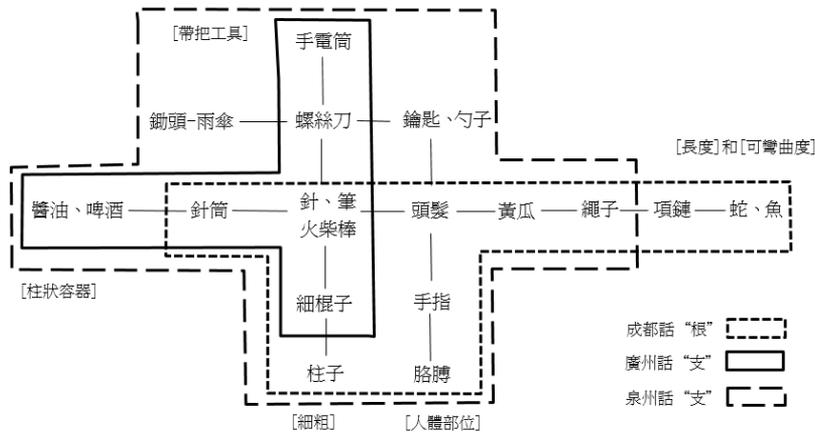
（5）粗細 我們以“細棍子”和“柱子”來測試方言的條形量詞系統是否對條形物的粗細敏感。結果發現只有粵語對這兩項進行區別，“細棍子”用“支”，“柱子”用“轆 [lok⁵]”⁹或“條”。不過，粵語中“轆”與“支/條”的“粗-細”對立並不嚴格，較細的條形物一定不能用“轆”，但較粗的條形物却仍可用“條”（“一條柱”）。

2.3.2. 條形量詞範疇的語義地圖

根據調查結果，我們繪製了漢語方言條形量詞範疇的概念空間，並畫上成都、廣州、泉州方言中相應的條形量詞（根 / 支）的語義地圖：

⁹ 陳小明（2010: 78）認為“轆”具有 [+條狀][+圓柱形][+粗] 的語義特徵。

圖四 漢語方言條形量詞的語義地圖



圖四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回路，“鑰匙、勺子”與“頭髮”兩個節點的連線主要為粵方言而設，廣州話“鑰匙”、“勺子”和“頭髮”都可用“條”，而在其他方言中這兩個節點很少用同一個量詞（如絕大多數官話方言都說“一根頭髮”、“一把鑰匙”）。圖四中部的節點“針、筆、火柴棒”代表的是北方方言的“根”和南方方言的“支”的核心成員。從核心區域出發，沿著“長度”與“可彎曲度”參數（圖四中中部橫行），“根”或“支”與“條”互相競爭；沿著“帶把工具”和“柱狀容器”參數，條形量詞與非條形量詞（如“把”、“瓶”）互相競爭。受到這些語義參數不同程度的影響，各個方言的條形量詞在每一個語義參數上有著不同程度的擴散。比較突出的是，閩粵兩種方言的條形量詞（“支”）在“帶把工具”和“柱狀容器”這兩個參數上的擴散範圍在所有方言中最廣；西南官話（成都話）的“根”在“可彎曲度”參數上的擴散強於其他官話方言。

3. 結論與討論

本文採用語義地圖模型與語義參數結合的方法研究形狀量詞的跨方言分佈，詳細比較了與形狀量詞相關的若干語義參數在方言中的具體實現，主要有以下發現：

3.1. “核心－擴散”分佈模式

本文的跨方言考察發現，無論顆粒、平面還是條形量詞都表現出“核心－擴散”的分佈模式。對於每一個維度的形狀量詞，都存在著若干個語義參數影響量詞的分佈範圍。每一個形狀量詞在這些語義參數中都有若干核心成員（事物），從這些核心成員出發，量詞的分佈範圍沿著各個語義參數向外擴散。由於某個特定的語義參數在不同方言中的影響力不同（如顆粒量詞的“大小”參數、平面量詞的“凸顯部位”參數、

條形量詞的“帶把工具”參數等），這種擴散在不同方言之間往往是不均勻的，因而形成形狀量詞的分佈在方言之間同中有異、參差不齊的格局。

“核心－擴散”模式可以為歷史上形狀量詞在各大方言中的分化和創新過程提供綫索，也可預測形狀量詞系統正在發生的變化。在語義地圖中，越遠離核心的成員可能越先發生量詞的變化（如被通用型量詞替換）。例如，在平面量詞語義地圖（圖三）中，“菜刀”位於“凸顯部位”參數的最外緣，若“凸顯部位”參數發生“把”對“張”的替換，那麼也應最先發生在“菜刀”這個成員上。事實上，“菜刀”在廣州話、肇慶話的新派中已經改用“把”，而“椅子”仍用“張”。當然，本文考察的方言樣本數量十分有限，所得的蘊含序列還需通過更大規模的樣本進行測試和調整。

3.2. 南北差異

如上所述，方言裏形狀量詞在各個語義參數上的擴散很不均勻，很難籠統地說哪個方言的形狀量詞分佈範圍“更大”或“更小”。不過，如果我們著眼於某些語義參數上發生的形狀量詞與非形狀量詞的競爭，則可以觀察到形狀量詞的分佈範圍大致上呈現出地理上由北往南逐漸擴大的連續統，這種系統的南北差異在顆粒、平面和條形三個維度的形狀量詞中均有相似的表現（見表一、二和四），可總結為下表（“>”表示分佈範圍左邊大於右邊，“/”表示左右兩邊相當）：

表六 形狀量詞與非形狀量詞競爭格局的南北差異

量詞小類	語義參數	分佈範圍大小的方言排序	詞彙形式
顆粒	大小	閩南語 / 湘南土話 > 粵語 / 吳語 > 官話方言	顆 / 粒 vs 個 / 隻
平面	凸顯部位	粵語 > 閩南語 > 客家話 > 官話方言	張 vs 把
條形	帶把工具	閩南語 > 粵語 > 客家話 / 江淮官話 > 其他官話方言	支 / 根 vs 把
	柱狀容器	閩南語 / 粵語 > 官話方言	支 / 根 vs 瓶

表六反映了閩粵等南方方言的形狀量詞在“大小”（顆粒）、“凸顯部位”（平面）和“帶把工具”（條形）等幾種語義參數上的分佈範圍均大於官話方言，總體上受非形狀量詞（如“把”、“個”）的影響弱於官話方言。其中，閩南語代表南北連續統的最南端，粵語次之，客家話和一些地理上屬南方的官話又次之，北方官話則代表最北端。¹⁰

¹⁰ 本文對南方方言的考察主要集中於粵語和閩南語，更精確的形狀量詞南北連續統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3.3. 粵方言形狀量詞的類型特點

以往對粵方言形狀量詞特點的概括多聚焦於特徵詞，或列舉個別形狀量詞與普通話的量詞之間一對多、多對一的關係（如陳小明 2010: 89-91）。本文則嘗試在形狀量詞“核心－擴散”的跨方言分佈模式的背景下對粵方言形狀量詞的類型特點進行歸納，總結如下：

表七 粵方言形狀量詞分佈的類型特點

	語義參數	分佈特點	關鍵節點舉例
顆粒量詞	大小	範圍大於大多數方言，小於閩南語	一粒湯圓 一隻乒乓波 _{乒乓球}
	圓－非圓	某些方言點發生擴散	一粒餅乾（南寧）
平面量詞	凸顯部位	範圍方言中最大	一張椅 一張刀
	凸顯形態	範圍與其他南方方言相當	一張席 _{涼席}
	人體部位	詞彙形式與其他方言不同	我塊面 _臉
	厚度與表面積	“塊”與“片”的區分與其他方言相似；“張”的範圍比北方官話大	一張臺布 _{桌布}
條形量詞	帶把工具	範圍大於大多數方言，小於閩南語	一支螺絲批 _{螺絲刀} 一條匙羹 _{勺子}
	柱狀容器	範圍大於大多數方言，與閩南語相近	一支酒
	人體部位	範圍較小，小於某些官話方言	一隻手指
	長度與可彎曲度	“條”的範圍可覆蓋長度較短和可彎曲度低的事物	一條頭髮 一條柱
	粗細	只有粵語存在這一參數，但粗細對立不嚴格	* 一轆棍仔 _{細棍子} 一轆 / 條柱

至此，本文借助語義地圖模型與語義參數結合的方法，論證了形狀量詞“核心－擴散”的跨方言分佈模式和分佈的南北差異，並以此為背景總結了粵方言形狀量詞分佈的類型特點。以上結論是基於共時平面考察的結果，而這種分佈格局背後的成因是複雜的，方言的存古、獨立演化和語言接觸都可能參與了這種格局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粵閩等南方方言的形狀量詞系統在某些語義參數上和官話差別較大，這些差異可能與在南方發生的語言接觸有關。游汝杰（1982）曾從量詞的語法功能（如“量＋名”結構表定指）的角度論證台語的量詞在吳、閩、粵等南方方言中留下了底層遺存；

那麼，我們也不能排除南方方言形狀量詞的分佈格局也受到南方非漢族語言影響的可能。比如，閩粵方言的條形量詞分佈較少受“把”的侵蝕與泰語、越南語等東南亞語言有一定相似之處。東南亞很多語言都存在著表示“長而有尖細末端”的量詞，漢語普通話中很多用“把”的事物（如“傘”）在這些語言中都被歸到這個量詞範疇（張禎 2009）；又如湘南土話的“粒”向通用型量詞發展可能與瑤語等少數民族語言的接觸有關（羅昕如 2004）。這些問題還有待更大範圍的考察、與歷時研究相結合去解答。

鳴謝

感謝《中國語文通訊》的兩位匿名審稿人和第 20 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參會代表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 陳小明。2010。《粵方言量詞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 高然。1999。閩南話、廣州話、北京話常用量詞的比較。收錄於高然：《語言與方言論稿》。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 197-212。
- 李小凡、張敏、郭銳等。2015。《漢語多功能語法形式的語義地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梁滢。2012。南寧話量詞的特點。收錄於北京師範大學漢語文化學院編：《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研究》（第 3 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50-59。
- 羅昕如。2003。湘南土話中的通用型量詞。《語言研究》第 4 期，頁 110-114。
- 羅昕如。2004。湘南土話中的底層語言現象。《民族語文》第 1 期，頁 20-25。
- 邵敬敏。1993。量詞的語義分析及其與名詞的雙向選擇。《中國語文》第 3 期，頁 181-188。
- 石毓智。2000。表物體形狀的量詞的認知基礎。收錄於石毓智：《語法的認知語義基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頁 119-132。
- 游汝杰。1982。論台語量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的底層遺存。《民族語文》第 2 期，頁 33-45。
- 張禎。2009。類型學背景下的漢泰語量詞語義系統對比和漢語量詞教學。《世界漢語教學》第 4 期，頁 508-518。
- 張禎。2010。《類型學視野的漢語名量詞演變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朱慶明。1994。析“支”、“條”、“根”。《世界漢語教學》第 3 期，頁 22-23。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an, Keith. 1977. Classifiers. *Language* 53(2): 285-311.
- De Haan, Ferdinand. 2004. On representing semantic map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MELD Language documentation conference 2004: Workshop on linguistic databases and best practice. Wayne State University, Detroit.
- Haspelmath, Martin. 2003. The geometry of grammatical meaning: Semantic maps and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2: 211-242.
- Tai, James H-Y. 1992. Variation in classifier system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Towards a cognition-based semantic approach. I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 Chinese Dialects*,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No. 2, 587-608. Taipei: Academia Sinica.

Tai, James H-Y. 1994.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and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ed. Mathew Chen and Ovid Tzeng, 479-494. Taipei: Pyramid Publishing Company.

The Distribution of Shape Classifier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pe Classifiers System in Yue Dialects

Yifa Xu

Peking University /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 distribution of shape classifiers (namely, the collocations between shape classifiers and nou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by combining the methods of semantic features analysis and the Semantic Maps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drawn from 19 dialect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hape classifiers (including three main types: round, flat and long) reveals a continuum across different dialects, which I called the “central-extended” distributional pattern. From north to south, generally, the range of nouns (things) that a shape classifier can collocate with in a dialect tends to become larger. Based on this pattern, I briefly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hape classifiers system in Yue dialects comparing to that in other dialects.

Keywords

shape classifiers, semantic maps model, dialectal comparison, central-extended distribution

通訊地址：香港 新界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

電郵地址：yxubq@connect.ust.hk

收稿日期：2016年2月3日

接受日期：2017年2月10日